

## 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研究进展\*

席艳乐 刘益冰 尹涓涓

**摘要:**随着新古典理论框架下共享一致偏好和预算约束的单一模型逐步向更为可靠的纳什家庭议价模型转变,区分家庭成员偏好的异质性议价能力作为解释家庭经济行为和决策的核心要素,成为家庭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内涵界定、测度体系、影响因素及经济效应四个方面对代表性文献进行归纳述评,认为个体特征、家庭结构、社会制度等是影响家庭议价能力的重要因素。同时,议价能力对家庭内部婚姻、金融、就业、生育、消费等家庭决策,以及对后代抚育、女性自主权利、主观感受等社会福利因素都将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本文围绕该领域的研究不足和可供拓展的方向进行了阐述,以期全面把握家庭内部议价能力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议价能力 家庭决策 社会福利

家庭作为融社会、经济和政治于一体的微观社会单元,具有强大的自组织和自治功能,兼具内部资源共享和规模经济等属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探讨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复杂配合以谋求分工与决策最优化的议价过程,能够有效揭示一系列家庭经济行为的内在逻辑,是近年来家庭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婚姻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关注的焦点(Campana et al, 2018; Basu & Maitra, 2020)。得益于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的改进,家庭层面的研究已从新古典理论框架下家庭成员共享一致偏好和预算约束的单一模型,逐步向区分家庭成员异质性偏好的纳什家庭议价模型和集体模型转变,使得基于家庭议价视角审视当代家庭决策的行为动因和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快速涌现,极大地丰富了议价能力变量在家庭分析中的应用和探讨。

虽然议价行为广泛存在于包括夫妻、父母、子女等在内的家庭成员之间,但现有理论与经验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已婚家庭成员,考察配偶之间的相对议价能力(Doss, 2013)。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复杂的家庭成员结构使得全面考察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分布及动态演变难度增大,从主导家庭资源配置的夫妻之间的议价能力变动视角来探究家庭决策的“黑箱”更具现实代表性。在此基础上,从家庭内部成员间的议价能力出发,考察个体和社会层面包括生理、心理、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揭示微观议价能力变动影响宏观经济变量背后蕴涵的经济机理,成为家庭经济学分析的核心问题。

有鉴于此,为更加立体、全面地展现家庭内部议价能力问题的研究进展,本文尝试围绕议价能力的起源和演进、概念与内涵、测度方法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从个体特征、家庭结构、社会制度等层面回顾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多维影响因素,并对其影响家庭决策与社会福利的经济效应进行探讨。最后,本文将基于现有研究的未尽与不足之处提出未来理论与经验研究方面可能的拓展方向,以期全面把握家庭内部议价能力问题提供有益借鉴与可靠参考。

\* 席艳乐、刘益冰、尹涓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国际商务研究所,邮政编码:430070,电子邮箱:helen6160@126.com,基金项目:湖北省社科联“深度学习——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培育项目专项基金。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 一、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内涵与测度

### (一)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内涵

1. 起源和演进。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一词最早由 Schelling(1956)提出,指经济行为主体在讨价还价、合同拟定以及达成协定过程中相互之间施加影响的能力。之后,这一概念拓展应用到与谈判相关的群体之间,如借贷双方、劳资关系、产权交易等领域。家庭被视为不同偏好和禀赋的谈判者的集合,将议价能力引入家庭分析的范畴,最早源于著名家庭经济学家 Becker(1965)的研究。他提出单个家庭成员的决策受制于其讨价还价的能力,认为家庭拥有独立的效用函数,家庭成员凭借各自工作的擅长程度以及效率高低等比较优势,在育儿数量、家务劳动、工作时长等方面相互影响并开展任务分配,从而打破了传统研究将家庭视为单一决策者运作的理论假设,开启了议价能力在家庭成员之间“此消彼长”进行分配的研究。这一进程与家庭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范式变革不谋而合,理论假设由“代表性偏好”的单一模型向异质性偏好和效用的议价模型、集体模型转变。

2. 概念和内涵。关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具体概念,学术界一般从“相对资源理论”出发,将其定义为家庭成员对于家庭内部资源禀赋的占有和控制能力,拥有更多资源的决策力就意味着有更高的议价能力(Ma & Piao, 2019)。虽然按照家庭内部的成员构成、各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等,可将家庭内部议价行为分为夫妻、子女、代际之间的议价等多个关系对,但考虑到多数理论与经验研究主要探讨已婚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配偶之间的相对议价能力,因而关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概念也日益向性别差异的视角下集中,转为对两性家庭分工、家庭地位等方面的探讨。且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性别观念的转变,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随女性的社会劳动参与度提升而打破,呈现出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相对增加(Gu, 2019)。因此,鉴于家庭决策的研究主要以夫妻之间的决策作为主要载体,本文也将研究视角置于家庭内部夫妻双方的议价能力配置视野下,就其代表性测算指标、关键影响因素及宏微观影响展开评述。

### (二)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测度方法

家庭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演进和嬗变为家庭议价能力的测度奠定了基础。传统的单一模型在满足所有家庭成员利他性、偏好一致性假设的基础上,假定所有家庭成员共同采用一个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成员之间资源分配的差异是家庭最优选择的结果(Becker, 1965)。随着基于博弈论的家庭模型出现,纳什议价模型进一步假定具有不同效用函数的家庭成员按照纳什合作博弈规则进行博弈,此时家庭成员在家庭之外所能获得的最大效用决定了该家庭成员的议价能力(Manser & Brown, 1981)。从理论上讲,在单一模型向议价模型转变的过程中,关于家庭内部决策机制和资源配置的描述更加清晰和精准,但实际研究中往往受到数据可得性等方面的约束,导致基于博弈模型的议价能力的测算显著少于新古典模型的实证研究。之后,相对于博弈议价模型更简单和更通用、区分家庭成员不同偏好的集体模型出现,认为家庭追求的目标是成员加权效用的最大化,而权重就取决于家庭成员的内部议价能力(Cherchye et al, 2012)。有鉴于此,本部分尝试基于现有经验研究,从家庭资本控制程度、外部政策冲击变量、社交网络指标等方面对学界常用的家庭议价能力代理变量进行梳理。

1. 家庭资本控制指标。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决定因素通常包括收入、相对非劳动收入、婚前资产、婚姻期间积累的资产份额、代际支持的资本等体现家庭资源地位和控制程度的指标,因而部分研究尝试以家庭资本控制指标来度量内部议价能力。如 Doss(1990)以非劳动收入指标作为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代理变量,考察其对夫妻劳动力供应和生育率的影响。Chau et al(2007)运用婚前资产作为替代指标。然而,家庭资产相关指标用于度量议价能力时也容易因潜在的双向因果关联而引发关于内生性问题的担忧,其适用性和准确性有待商榷(Jayachandran, 2015)。

2. 外部政策冲击指标。相较于内生的家庭层面的财务或资本变量,部分研究试图通过构建外生

的政策冲击变量,用以测度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例如,Anderson(2018)通过量化女性财产权、女性自主权变量以衡量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Shelkova(2020)以2007年俄罗斯《母亲资本法》的颁布为政策冲击,认为该政策为育有两个及两个以上子女的女性提供非现金补贴以赋予女性更大的经济自主权,从而能够体现女性议价能力的提升。Basu & Maitra(2020)将婚姻市场中的性别比例作为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衡量指标,以避免使用家庭层面变量的潜在偏误。

3. 社交网络指标。强大的社交网络能够为对应的家庭成员带来关系优势,从而减少其在社会融合、收入以及就业方面的潜在威胁,是较好的议价能力度量指标。La Mattina(2017)在构建模型时将社交网络中的结构性地位作为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并将其视为潜在家庭议价资源。Esping-Andersen & Schmitt(2020)综合考虑合作伙伴的社交网络好友数量和身体吸引力等因素,借助身体质量指数数据衡量议价能力,认为现阶段可能存在由社交网络所构建的家庭动态议价过程。

当然,在大量的经验研究中,除了上述相对收入或资本拥有量、外部政策调整、社交网络变量等客观指标外,也有部分文献尝试构造主观变量进行测度。例如,Ambler(2016)基于夫妻双方在问卷调查中关于“做主要决策次数更多者”的互评分数构造议价能力的代理变量,以识别养老金政策调整对于夫妻双方议价能力的影响。也有部分文献基于类似的做法,借助微观调查询问配偶之间关于孩子升学或就业、购买不动产等的决策,根据答案构造“主要决策者”以定义为议价能力更高者。Qian & Qian(2015)则尝试借助心理学领域的“自我认同量表”等工具,构建女性自我认同指标,这种自我价值评估也可以作为议价能力的主观呈现。

综上所述,尽管家庭议价能力的概念界定方面少有分歧,但大量实证研究中关于议价能力的测算丰富多维,现有研究仍未就统一规范的议价能力度量标准和测算体系达成一致。囿于微观调查数据自身的限制,使用家庭层面的客观收入、资产指标,或者个体层面的受教育水平等变量仍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困扰,而主观指标的量化也多缺乏稳健数据支持。在经验研究中,核心指标的测量偏误将会显著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因此,后续研究仍需综合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层次,系统运用各种方法,化解现有指标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基于数理模型构建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准确性的议价能力指标。

## 二、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影响因素

随着家庭内部决策理论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已有文献围绕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在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关于该方面的研究具体可以概括为个体特征、家庭结构和社会因素三个方面。

### (一)个体特征

个体特征是影响其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重要因素(Majlesi,2016)。本部分从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这两个方面来评述个体特征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影响。

1. 受教育程度。受教育水平是学者们感兴趣且易捕捉的关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总体而言,关于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影响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女性视角,以突出其对女性议价能力提升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会影响夫妻的家庭内部经济决策,女性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会随着其受教育程度的上升而增加(Dhanaraj & Mahambare, 2019)。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可以决定未来的配偶选择,进而提升其婚后谈判地位。例如,Ashraf et al(2020)使用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以及赞比亚的类似项目作为准自然实验,探究了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彩礼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女儿受教育程度与女方父母收到的彩礼价值水平正相关,因此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应该被视为提升个人在婚姻市场和未来家庭决策地位的有效策略。Moeni(2021)利用2006—2013年间伊朗的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数据对个人议价能力问题展开研究发现,教育能够同时带来货币与非货币型报酬,当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其配偶时,女性的议价能力会随之增强。此外,有研究表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除了有助于提升其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外,还有

助于子女母姓命名权的加强(Li et al,2021)。

2. 健康状况。相比教育因素,将健康状况视为独立因素来考察其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已有研究表明,个人的身体素质是其议价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和教育等关键家庭用品支出份额的增加会显著提升女性的健康状况,而女性健康状况的改善不仅能够增加其家庭决策的权力,而且对于改善子女生活状况都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Anderson et al,2017;Doepke & Tertilt,2019)。

## (二)家庭结构

1. 家庭成员结构。家庭成员的规模和结构等特征是影响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分配的重要因素。在发展中国家,老人与子女等几代人共同居住、共同生活的家庭格局较为常见,这将会显著影响夫妻间议价能力的变化,导致家庭内部的不平等。事实上,相比单独居住的家庭,共同居住家庭能够更多地享受来自家庭公共产品的益处,行使主要决策权的家庭成员通常也具备更高的议价能力。Debnath(2015)基于印度家庭调查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考察了家庭结构对女性控制权的影响,发现生活在更为单一的家庭中的女性更有可能拥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权。同样地,Dhanaraj & Mahambare(2019)考察了印度农村地区家庭结构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更可能会为了节省开销选择自行承担老人护理相关的活动,从而导致生活在共同居住家庭中的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率降低约12个百分点,伴随的后果则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议价能力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Khan et al(2021)也发现,家庭文化是影响女性议价能力的关键要素之一,其基于巴基斯坦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当已婚女性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若成年人数量越多或婆婆在场时,她们的议价能力将会显著降低。

2. 配偶相对差距。配偶间关于教育、收入和就业状况等方面的相对差距直接影响双方的议价能力。在配偶相对教育差距方面,通常认为男性配偶受教育水平越高,女性配偶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越低,两者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若家庭中女性配偶的财务知识储备比男性配偶更丰富,则女性确保其生活水平得到更高保护的能力越强,家庭内部议价能力越强(Meurs & Giddings,2012; Bertocchi et al,2014)。

在相对收入差距方面,部分研究以发达国家为样本进行分析。如Schneebaum & Mader(2013)基于欧洲的证据指出,在教育、收入和就业状况上差距更小的夫妇更有可能共同做出家庭决策,所以旨在降低性别薪酬差距的政策可能有助于促进家庭内部决策权方面的平等。Theloudis(2018)基于1980年以来美国已婚人士时间分配变化、性别收入差距缩小等现实,立足相对收入差距视角,采用美国收入动态面板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女性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会随着性别工资收入差距的缩小而提升。另一方面,以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国家为样本的研究通常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Luke & Munshi(2011)以经济全球化为外生政策冲击,考察了开放对印度南部茶园中从事收入相对固定且不因种姓而异的工作的女性职业变动的的影响,发现全球化有助于女性选择报酬更高的工作,借以改变其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Getahun & Villanger(2018)基于埃塞俄比亚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女性从事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带来的收入效应可以缩小与配偶的收入差距,具有改善其外部选择、提升自信并强化性别平等态度等方面的积极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女性增收并不必然提升其家庭议价能力,只有当收入被女性实际控制时,才有助于增加其在家庭决策中的自主权。当婚姻中夫妻双方关于家庭决策事务未达成一致意见时,女性对自身收入实际控制的增强有助于增强其家庭内部议价能力(Wang,2014;Osamor & Grady,2016)。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认为年龄、收入等方面的差距并不能带来额外的议价能力提升,配偶间耐心、储蓄、风险承受能力、个人偏好等方面的相对权力也会对议价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Gnagay et al,2020)。

3. 婚前财产差距。家庭内部的财富拥有与分配格局也会作用于议价能力。相较于个体持有的金融资产、不动产等,以彩礼或嫁妆为代表的婚姻转移资产通常被视为配偶或其亲属之间的补偿转移,体现了不同家庭资产状况和分配格局对婚内议价能力的重要影响。在婚姻中,女性单独拥有的

资产数量越高将越有助于增强其婚后的议价能力,因而父母会通过资产转让的方式来影响女儿在婚姻中的家庭地位(Anderson & Bidner, 2015)。此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扶贫项目规定可以向女户主转移资金或提供福利。这种减贫战略可以增加女性资源控制和增强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从而导致家庭内部权力平衡的转变,最终增加女性进入或退出婚姻选择行为的自主权(Castilla & Walker, 2013)。

### (三) 社会因素

除了个体特征和家庭结构外,社会因素也是影响家庭内部议价能力所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新近文献分别从社会文化规范和外部制度环境等视角对两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问题进行了探讨。

1. 社会文化规范。社会文化规范会对夫妻双方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在早先的母系社会中,女性拥有更高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而在具备父权制特征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文化偏见的存在使得女性无偿家务劳动的负担并不会因为其参与到劳动力市场而减少,甚至可能导致以家庭为中心的女性选择放弃参与劳动力市场,这必然使其在家庭关系中处于较弱的地位(Bwanga & Kabonesa, 2015; Shibata et al, 2020)。从家庭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家庭成员之间多依据性别、生理、擅长项目及文化规范进行角色分工。其中男性多参与家庭外部公共活动,而女性则以生育和日常家务劳动等私人领域活动为主。传统的社会文化规范可能使女性更偏向于从事能够协调工作和家庭的职业。一些研究发现,即便近几十年来日本及拉美国家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和劳动贡献率有所提升,但家庭内部工作时间分配仍然存在显著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男性在有偿工作上投入时间较多,而女性则更多投身于护理等无偿家务劳动中(Campana et al, 2018; Ma & Piao, 2019)。而且,即使女性与男性一样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其劳动分配后所得到的权利仍较为不公平。例如, Rahman et al(2020)基于240对随机挑选的夫妇访谈数据,就孟加拉国西北部地区女性参与水稻和蔬菜种植以及农场决策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女性在该国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她们依然被男性同行忽视或低估且其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也较低。

传统的社会文化观念可能导致家庭性别比例失衡,而家庭性别比例对家庭资源分配而言至关重要。部分学者基于性别比例失衡视角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Bhaskar & Hopkins(2016)从理论上论证了性别失衡会导致夫妻双方对儿子的过度投资和对女儿投资的相对不足。因此,在性别失衡程度更高的情况下反而会强化婚姻市场中男性之间的竞争,无形中会提升女性的议价能力。Porter(2016)基于中国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性别失衡可以提高女性在婚配时以及婚后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中的议价能力,扩大女性在“婚姻盈余”中的份额。Basu & Maitra(2020)基于伊朗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议价能力会因男性多于女性而朝着有利于女性的方向倾斜。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传统的性别文化观念,女性生育子女的性别对其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也有重要影响。例如, Zimmermann(2018)采用1998年、1999年与2005年印度国家级家庭数据集为研究样本,探究女性生育胎儿的性别对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女性在短期内拥有更高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Alakshendra & Li(2020)基于印度全国家庭与健康调查数据(NFHS)的研究发现,在决定家庭支出时,至少生育过一个儿子的女性在家庭中享有更高的家庭议价能力,可以更多地参与家庭财务决策。

2. 外部制度环境。影响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外部制度环境包括土地与住房资产、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颁布或修订等方面。

第一,土地与住房资产是影响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中最具生产力的资产,土地资源的获取成为提升女性家庭自主权的有效途径。然而,随着国家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的家庭的减少,房屋资产的地位大幅提升,这也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产权改革的重要推动力(Doss, 2013)。在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背景下, Wang(2014)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探讨了个人层面的产权转移能否增加个体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结果表明,女性产权会对女性议价能力产生积极影响,而当产权转移给男性时则结果相反。Zang et al(2022)采用2010

—2014年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家庭内部产权分配变化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产权的相对减少显著降低了女性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

第二,养老保险是影响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另一重要因素。现收现付养老金增加引发的当前和相对预期收入再分配的变化会改变夫妻间的权利平衡。若女性寿命较长,其议价能力也会随着养老金规模的增加而增强。目前直接关于养老保险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影响的研究较为有限,Berniell et al(2020)和 Ambler(2021)是少有的例外。Berniell et al(2020)基于2004—2009年间阿根廷永久住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源于社会方案的收入转移会影响到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分配。阿根廷的非缴费养老金改革会增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减少其成为家务唯一责任人的可能并增加丈夫对家务的参与度。Ambler(2021)基于2008年南非国民收入动态调查数据同样发现了养老保险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积极影响。当女性有资格领取养老金时,其个人收入份额的增加将导致其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增加,其成为家庭主要决策者的可能性将增加13%~17%。

第三,法律制度的颁布或修订也可能在家庭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家庭法、继承法、婚姻法及公共政策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同样具有一定的影响力。Hallward-Driemeier & Gajigo(2015)基于埃塞俄比亚2000年修订家庭法的研究发现,女性拥有共同管理婚姻财产的权力、男性配偶不能拒绝女性外出工作及提升女性最低结婚年龄等一系列举措显著增加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和家务劳动“退出”的选择权。在继承法方面,女性接触继承权平等发展的改革能够提高其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自主权(Deininger et al,2013;Harari,2019)。Dong(2022)考察了中国2011年婚姻法的修订对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修订婚姻法会导致女性失去部分家庭财产所有权并降低其家庭内部议价能力。有关离婚的法律也可以通过影响伴侣收入水平和财产权利分配从而作用于夫妻之间的相对谈判地位,致使家庭权力重新分配。有研究发现,在美国的大多数州,法律规定婚姻期间的收入及使用这些收入获得的资产是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由配偶平均分配或“公平”分配。相比之下,遗产则完全属于继承人,美国管理婚姻财产的法律将遗产继承排除在财产分配之外的做法明确增加了继承者而不是其配偶的外部选择权的价值,从而增强了继承人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Blau & Goodstein,2016)。

需要指出的是,影响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已有文献所关注的个体特征、家庭结构和社会因素等维度外,还有其他一些前述研究所忽略的影响因素值得进一步探讨。关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影响因素的深层次、宽维度探究,依然是后续研究需进一步关注的方向。

### 三、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家庭决策的影响

家庭决策权是指在家庭生活中有关日常事务和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关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家庭决策的影响是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分支。为了更加全面探究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家庭决策的影响,本部分主要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婚姻决策、金融决策、就业决策、生育决策以及消费决策五个方面展开评述。

#### (一)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婚姻决策

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独立能力的增强,她们从婚姻中获得的净收益降低,女性缔结婚姻的意愿降低,初婚年龄推迟,女性对于婚姻决策的认知随之发生改变(Lindstrom et al,2022)。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婚姻决策的影响可以从结婚时机和婚姻存续两个方面考量。

1. 结婚时机。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结婚时机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会对个人的晚婚选择形成正向激励。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相对稀缺所引发的议价能力上涨会使得部分男性推迟结婚并减少烟酒消费(Porter,2016)。与此同时,出于应对结婚后所产生的各种不确定性,女性倾向于在婚前努力积累资产、增强自身议价能力,从而可能导致结婚时间的推迟。另一方面,与外生冲击有关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又可能会引发早婚问题。由于农业和非正规就业占据主

导地位,发展中国的个人收入极不稳定,而且还会受到诸如天气状况、宏观经济冲击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可能导致配偶之间协商频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家庭内部议价能力(Baland & Ziparo, 2018)。例如,有研究发现,干旱导致作物产量降低的收入冲击扩大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女性童婚的风险,再次从侧面证明了与外生冲击有关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结婚时机有重要影响(Corno et al, 2020)。

2. 婚姻存续。关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婚姻存续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由女性收入上涨、女性独立与权利意识增强以及女性升职等导致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变化对离婚结果的可能影响。一般而言,女性收入上涨与其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提升正相关。妻子在夫妻收入份额中占比越高,离婚的可能性就越大(Bertrand et al, 2015)。同时,女性独立与权利意识增强也是离婚率上升的主要驱动力之一。1999—2009年间,英国离婚案件从平均每年2万起飙升至每年20多万起。与此相似,在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条件大幅改善之后,女性的独立性及离婚率都有所提高(Dayanti & Dartanto, 2017)。在瑞典,升职后女性的离婚率会翻倍、男性则不会,而这些较高的离婚率可能是由于女性晋升后重新协商家务等压力造成的(Folke & Rickne, 2020)。

### (二)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金融决策

一些研究把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家庭金融决策相联系。研究发现,议价能力更强的家庭成员的风险厌恶程度决定了家庭金融决策的风险偏好。一般而言,家庭照料责任和管理作用使女性更强烈地认为家庭投资及消费需要保持平稳,进而可能导致女性出于预防动机比男性储蓄更多。因此,基于女性风险厌恶这一特征,女性决策权的增加降低了家庭的股票市场参与,减少了风险投资的财富份额,投资组合风险与异质性风险减弱,而持有房地产财富的可能性则显著增加。Addoum et al(2016)基于有限婚姻承诺的生命周期模型,利用美国收入动态面板数据探究了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家庭投资组合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妻子议价能力的提高与家庭风险资产的配置高度负相关,而男性议价能力的增强将增加家庭风险资产的持有。Gu(2019)利用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数据进行研究,丈夫为金融决策者的家庭比妻子为金融决策者的家庭更依恋金融市场,这可能归因于两性风险偏好的差异和议价能力性别不对称之间的关联。

此外,部分研究发现女性家庭议价能力的提升对于是否给予女方父母钱财具有显著影响,女性决策权的增强与增加女方父母钱财转移支付正相关。例如,Belanger et al(2011)利用越南250户移民家庭数据研究了女性作为生活在亚洲国家的“外籍妻子”向女方家庭汇款的可能。作者发现向女方家庭汇款的现象更容易发生在那些外语流畅、至少有一个孩子、年龄更大、受教育程度更高、有工作的女性移民身上。可能的解释是,拥有更高社会资本的女性通常在新家庭中地位更高,在协商汇款时也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Lyn(2021)利用2007—2008年间墨西哥约8400个家庭面板数据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女性家庭议价能力影响女性协商汇款给其原生家庭的能力,其家庭内部议价能力越高,转移支付给自身父母钱财的能力就越强。

### (三)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就业决策

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家庭就业决策密切相关,但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一方面,就业是影响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大小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家庭成员的劳动力市场参与、职业选择也有着显著的影响(Huang et al, 2021)。

1. 劳动力市场参与。一些研究认为,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其劳动力市场参与。传统的性别规范通常将女性束缚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但随着女性对收入控制的增加而导致的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提高,会使她们从传统的性别规范中解脱出来,提高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Field et al, 2016; Gay et al, 2018)。然而,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提升反而会减少女性劳动力供应,而对男性劳动力参与则存在不确定性影响(Haddad, 2015; Blau & Goodstein, 2016)。这可能是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男性很少被比他们更聪明或更有野心的女性吸引;二是议价能力强的女性的家庭养老照料责任会显著阻碍其参与就业(Huang et al, 2021)。此外,也

有学者研究认为,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提升并不必然降低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两者呈现“倒U”型关系,或者说,随着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增强,她们会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而只有其议价能力超过一定水平时,女性才会降低其外出工作的可能(Moenei,2021)。

2. 职业选择。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提高会使其在职业选择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最终表现为具有更高回报的职业中女性人数的显著增加(Hallward-Driemeier & Gajigo,2015)。除了有助于增加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外,消除性别工资差距引致的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提升也会使得女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全职工作的比例上升至与男性相当的水平(Theloudis,2018)。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丈夫享有较高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前提下,妻子的劳动力供应与职业选择可能会受到较大的限制。例如,Lowe & McKelway(2019)基于印度北方邦东部地区农村女性的数据研究发现,具有较高议价能力的丈夫对妻子的职业选择会产生关键性影响。当丈夫更加认可女性职业时,妻子的从业率是丈夫不认可情况下的两倍多。

#### (四)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生育决策

生育不仅包括怀孕、分娩、休假与哺乳等环节,还有后续漫长的养育过程。在该过程中,往往存在较高的照料压力和养育成本。当家庭照料需求加大时,多数家庭选择挤压女性工作时间,牺牲女性劳动供给从而使其承担起家庭生产活动。生育间隔和生育数量的选择与夫妻双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关系密切。

1. 生育间隔。生育时机是妇女育龄期内总分娩次数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由于生育行为受年龄的自然限制,婚育间隔过长可能导致非自愿不育的增加,进而显著拉低生育水平。既往文献发现,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是影响生育间隔的重要因素,且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增强可能会显著延长相邻两次分娩之间的时间间隔(Mansoor,2018;Moenei & Moenei,2021)。此外,夫妻间议价能力的高低与家庭是否生育三胎关系密切,议价能力的平衡可能会延缓家庭第三胎的生育计划(Moenei & Moenei,2021)。

2. 生育数量。新家庭经济理论认为,女性日益增长的经济独立性减少了其基于传统家庭内部分工所得的婚姻收益,并增加了生育成本。一些研究发现,随着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不断提升,女性生育率会逐步下降。但如果男性家庭活动参与度较高,在子女的养育上花费较多的心力,从而减轻女性抚育子女的负担,女性的生育意愿又会随之上升(Park et al,2010;Goldscheider et al,2015)。女性收入水平的提升会带来其议价能力的提高,进而有助于其更好地维护个人生育偏好(Deiningner et al,2013)。事实上,夫妻双方生育问题上的偏好并不总是相同,生育数量的决定通常取决于双方的议价能力(Moenei & Moenei,2021)。若女性的家庭议价能力较低,则男性在生育问题上就会有更大的决策权,此时女性的生育率也会更高。若女性的家庭议价能力较强,则其在生育问题上具有更高的决策权,出于追求质量而非生育数量的考量,女性往往会减少生育数量(Doepke & Kindermann,2019)。需要指出的是,女性议价能力的提升还会减轻对子女的性别偏见,从而减少女性有损自身健康的选择性堕胎行为,并提升女性儿童的相对存活率(Sun & Zhao,2016)。

#### (五)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消费决策

1. 家庭消费。一般而言,家庭成员的消费偏好因性别而异,这些差异显著影响家庭资源分配。与男性相比,女性往往更偏好于对家庭公共物品的投资,如家庭食物开销、健康支出和子女教育投入等(Booyesen & Guvuriro,2021)。因此,夫妻双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高低对家庭消费决策会产生重要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提升会增加妻子所关心的家庭公用消费物品的消费。例如,Jun et al(2021)基于2000—2018年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组国家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广义矩估计法考察了女性家庭议价能力与家庭消费支出的关系,研究发现具有较高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和强迫性购买行为的职场女性会显著影响家庭消费支出。Mishra & Sam(2016)采用2001年和2011年尼泊尔人口与健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女性议价能力的增强使资源



转向女性偏好,增加了家庭保健和营养等方面的支出。Pangaribowo & Tsegai(2019)利用印度尼西亚家庭生活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议价能力较高的女性会提高肉类、鱼类和乳制品等方面的家庭支出。

2. 个人消费。已有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的偏好差异将会导致其主导的家庭在生存型消费、教育消费、文化旅游消费等消费内容上发生结构性变化,因而探讨家庭议价能力变动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具有较强现实意义。例如,Majlesi(2016)发现,如果女性在家庭资源分配中拥有更大的权利,那么她们很可能把更多的资源分配给自己偏好产品的消费上。女性议价能力提升使她们可以控制对自己私人物品和服务的决策权,从而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消费支出决策。Mauri & Wolf(2021)认为,男女在高雅艺术消费方面存在系统差异,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参加高雅的艺术活动。因此,当女性拥有更大的家庭议价能力时,家庭往往会参加更多此类活动,从而增加该类型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发现,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提高会抑制丈夫自身消费商品的支出。例如,Porter(2016)基于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女性议价能力的增强,家庭消费中烟草和酒精的消费显著减少。Khan et al(2021)考察了女性议价能力对于旅游支出的影响,发现议价能力越高的女性往往因其有固定工作、受过良好教育而更加倾向于将支出适当向旅游和娱乐倾斜,增加外出旅行的频率。

#### 四、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社会福利

基于不同视角探讨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变化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程度是发展经济学家探讨的重要领域。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后代抚育、女性自主权利、主观感受之间的关系。

##### (一)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后代抚育

一些研究发现,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可以通过影响教育资源分配、医疗资源分配和子代自身成长发育,进一步拓展其所享用的社会福利空间(Yakita,2018;Xiao et al,2023)。

1. 教育代际传递。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往往会选择生育较少数量的子女。而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女性会提高子女教育的投资需求,这就是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教育代际传递的有效结果。Afridi et al(2016)使用2007年与2009—2010年间印度安得拉邦儿童与家庭层面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女性劳动力参与家庭决策对其子女教育成果的影响。研究表明,母亲参加工作会提升其在家庭决策中的地位,进而对延长子女受教育年限产生积极影响。Hendrick & Marteleto(2017)基于2011—2012年间洪都拉斯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探究了女性参与家庭决策与其子女入学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中母亲角色议价能力的提升对其子女入学率具有显著促进影响。

此外,虽然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提升对提高子女受教育水平存在积极且显著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异质性。一些研究发现,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越弱,该家庭中女性儿童所获得的教育时间分配就越少、获得的家庭人力资本投入就越低。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提升对女性儿童的教育支出影响更为显著。更进一步,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提升将有助于男孩和女孩获得更为平等的待遇(Nordman & Sharma,2016;Wang & Cheng,2021;Saleemi & Kofol,2022)。

2. 医疗资源分配。女性在家庭决策中作用的增强可能会有助于子女健康状况、家庭医疗资源分配结构的改善。例如,Majlesi(2016)的研究发现,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议价能力的提升使其更有可能做出增加孩子健康医药支出方面的相关决策。Mukong & Burns(2019)基于2010年坦桑尼亚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利用嵌套多项式logit模型考察了配偶之间的权力分配对医疗资源分配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的家庭议价能力的提升增加了女性的医疗资源分配,进而提高了女性在卫生设施中进行分娩的可能性。Calvi(2020)以印度继承法修正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也证明了上述结论。当女性家庭地位提高后,承担母亲角色的她们可能会将更多的家庭医疗健康资源转移至子女。Basu & Maitra(2020)基于伊朗收入与支出调查数据探究了女性议价能力的有效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女性议价能力的提升会显著促进医疗支出结构、家庭教育模式的改进。

3. 子女成长发育。相较于男性,女性更愿意将其收入花费于食品、健康等家庭支出方面。因此

相关研究认为,随着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提高,孩子成长发育健康有望得到更为充分的保障。例如,Kulkarni(2020)采用2012年尼泊尔调查数据探究了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子女营养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尼泊尔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提升对于解决婴幼儿不良喂养方式具有积极影响。Mukong & Burns(2021)基于Heckman两步法研究了父母家庭议价能力对坦桑尼亚城乡儿童健康差异的影响和贡献,研究结果表明,对女性伴侣的家庭暴力增加了儿童发育迟缓的可能性,农村女性家庭议价能力的提升对减少城乡子女成长发育差异至关重要。

## (二)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女性自主权利

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就业程度和民主参与程度等方面的提高,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伴随的女性自主权利的提升问题也日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热点(Li et al,2021)。一方面,女性自主权利的提升有助于减少其所面临的家庭暴力问题。一些研究发现,具有较低议价能力的女性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面临更大的家庭暴力风险,而提高女性家庭议价能力的政策将会有效降低这种风险,并增加其逃离糟糕婚姻的能力(Heath,2014;Pollak,2019)。在现实生活中,剥夺女性权利的状况较为普遍,家庭及家庭内部关系往往是女性无力感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当男性失去其养家糊口的传统角色并在权力上相对于配偶处于劣势时,其更有可能诉诸暴力,从而使女性成为冲突与家庭暴力的直接受害者、并加剧这种暴力代际传播的可能性(La Mattina,2017;Calvi & Keskar,2021)。另一方面,女性自主权利的提升将会使其更倾向于做出有利于孩子和家庭的决定,从而影响整体家庭福利。女性自主权力的增加不仅能够产生诸如降低生育率、改善子女教育和健康状况、提升子女资源分配度等短期效果,还能够产生促进两性平等、提高女性的政治话语权等长期利益(Getahun & Villanger,2018;Ma & Piao,2019;Guvuriro & Booysen,2021)。

## (三)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主观感受

家庭成员间议价能力的变化与其他客观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成员的主观感受(Orth & Robins,2014)。在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影响家庭成员主观感受的众多因素中,已有文献主要关注婚姻满意度、婚姻稳定性和生活幸福感这三个方面。

1. 婚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是个人主观感受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的伴侣模型和角色协作观点都认为,夫妻间共担责任并从事更多相似的活动,婚姻满意度将增加(Wilcox & Nock,2006)。一些研究显示,女性家庭议价能力的提高对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积极影响。例如,Grosjean & Brooks(2017)研究发现,性别比例会通过家庭内部议价能力渠道而对婚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Li et al(2022)的研究亦发现,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会增强女性的婚姻满意度。

2. 婚姻稳定度。有相关学者研究发现,家庭议价能力还可能进一步影响婚姻的稳定程度。例如,Zhang & Tsang(2012)基于分层回归模型,选取了763名中国城市已婚女性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家庭议价能力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议价能力与婚姻稳定性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Dayanti & Dartanto(2017)根据印度尼西亚752名已婚女性的在线调查数据,研究了女性家庭议价能力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研究表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婚姻稳定性之间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较高的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婚姻的稳定度,但该影响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若超过该门槛值,则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越高,其婚姻可能越不稳定。

3. 生活幸福感。家庭是个人与幸福的重要来源,家庭成员的特征和行为会影响个体幸福,或者说,家庭内部存在幸福感溢出效应(Gray et al,2013)。有研究表明,传统中国女性的幸福感更多来自那些与社会规范相一致的行为,比如家庭稳定、夫妻关系和谐、配偶事业成功等。而作为影响家庭关系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提升会显著提升其生活幸福感(Ma & Piao,2019)。

如前所述,以上文献从社会福利视角为探讨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影响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证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由于个体感受存在异质性且涉及因素较为复杂,其受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影响层级及范围仍需展开进一步探究。另一方面,现有研究侧重于探讨家庭内部议价能

力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并未充分关注家庭内部议价能力视角下有关幸福感的跨国差异比较,因而如何将国家间的现实关联、政策互动纳入对比分析中,也是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 五、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研究进展的全面梳理与剖析,本文探究了影响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重要因素,同时就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变化对家庭决策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展开多视角、系统化述评。现有文献围绕家庭内部议价能力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探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然而,已有研究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方面尚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未来关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问题的研究可进一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 (一)完善理论基础

1. 进一步完善理论模型的设定。家庭成员关系的特殊性在于既有利己性又包含利他性,这导致家庭环境下个体的决策目标多元化。单一决策模型的研究中未考虑家庭成员间的目标差异,因而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家庭行为的现实情况。纳什均衡模型和集体模型虽然将不同个体偏好和议价能力纳入分析框架,但前者未考虑多阶段家庭议价能力的研究测度,而且整个测度过程较为抽象与复杂;后者虽然更加简单与通用,但却无法如纳什均衡一样将家庭成员间相互影响纳入研究范围。因此在理论模型的设定方面,如何更好地平衡分析家庭成员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与测度的技术复杂程度,是未来理论研究要重点关注的方向之一。

2. 探究关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影响因素的理论基础。现有关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关注于找寻相关的影响因素,聚焦于经验研究检验环节,忽略了关于这些影响因素的理论基础研究。虽然有部分学者从相对资源论和制度文化论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考虑到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影响因素理论基础的多样化和复杂性,未来关于该方面的研究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Murshid,2018;Weiland,2022)。

### (二)优化经验研究方法

1. 改进研究方法。随着经验研究的普及,实证研究方法的变化也同样日新月异,现阶段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实证方法也逐渐被引入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研究中。尽管实证研究范式的推陈出新带来了有关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相关研究的持续完善,但该领域的研究仍因所采用的微观调查数据本身的局限性,受到来自数据可靠性相对较差、核心变量存在潜在的加总偏误或测量误差、双向因果导致内生性问题未能妥善解决等方面的困扰。例如,Shelkova(2020)与Dong(2022)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研究方法,分别研究了俄罗斯2007年颁布的《母亲资本法》以及中国2011年婚姻法改革事件的政策冲击影响,就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男性私人消费、婚姻稳定性等问题进行了因果推断,但二者所采用的双重差分法对于内生性问题的考量并不全面,潜在的双向因果等内生缺陷未得到完全有效解决。因此,未来该主题下的经验研究需要引入更为规范、全面的因果识别手段,更为完备地化解数据质量等方面的制约,将双重差分法向合成控制双重差分法、异质性多期双重差分法等更具严谨性与前沿性的微观计量手段方面拓展。

2. 加深影响渠道的识别检验。既有研究归纳总结了关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影响因素,并就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家庭决策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展开了详细地探讨。但是,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产生作用的影响渠道却未进行系统探讨。这使得关于两者间因果关系的实证分析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而也使得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健性有待商榷。未来,加深影响渠道的识别检验、明晰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其他因素间的底层逻辑与内在机理,克服潜在的双向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仍是未来实证研究所需关注的重要方向之一。

### (三)深化研究内容

1. 丰富和完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测度指标体系。现有文献并未就统一规范的议价能力度量标

准和测算体系达成一致。而且,现有研究指标多从单个维度来审视家庭内部议价能力,鲜有综合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系统测度的指标体系。最新的研究中,部分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例如,Alakshendra & Li(2020)综合收入、教育、年龄等指标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展开了测度;Moeeni & Moeeni(2021)通过构建家庭内部夫妻的相对教育资格以及省级层面男女性别差距得分的综合指标来衡量家庭内部议价能力。未来,如何基于数理模型构建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准确性的议价能力指标仍是后续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2. 深化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影响因素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一方面,关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多维度、深层次的。除了已有文献所关注的个体特征、家庭结构和社会因素等维度外,还有其他一些前述研究所忽略的影响因素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Wang et al(2020)以2008—2010年间中国农村城市移民数据为样本,利用logit模型研究了农村家庭迁移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迁移情况的增多对于提升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具有显著影响。然而,该文样本限制在双职工家庭范围,对于不同家庭收入的异质性影响方面考虑也较为有限。另一方面,已有文献主要关注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于家庭决策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但实际上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影响是宽领域的。一些研究表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企业运营、农作物技术投入和创业投资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例如,Friedson-Ridenour & Pierotti(2019)研究发现,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女性做出商业决策具有显著影响。Miura et al(2020)证实了赞比亚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提升对于引入农作物高新种植技术具有显著积极影响。更加全方位、多元化地探索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影响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问题。

3. 关注外部宏观政策冲击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影响。将外生冲击事件纳入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考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一些学者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例如,Seiz(2021)以西班牙双职工家庭为调查对象,利用收集的1287份调查问卷数据,研究了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对于家庭内部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即使是具有较高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西班牙职业女性,在分娩期间也会比丈夫承担更多超负荷的工作。同样地,Steinmetz et al(2022)采用瑞士家庭小组数据分析了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期间双职工且有孩子的家庭的内部分工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部分变化与性别有关,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男性显著减少了其花费在家务上的时间,而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女性增加了家务劳动时间。除此之外,诸如贸易政策工具、外资政策调整等政策冲击都可能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关于这些政策冲击影响的探讨也是拓宽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研究的重要方向。

4. 考虑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与拓展。一是关注家庭经济学与公司金融学的关系。一般而言,男性可能是控制决策动态、储蓄和投资决策的主要力量。虽然妻子一般在幕后默默付出和无偿劳动,但不可否认她们在丈夫的新创企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配偶还可以直接参与新创企业的经营活动,通过为企业提供劳动力和金融知识等服务助力新创企业成长(Dyer et al, 2014; Lee & Persson, 2016)。此外,有研究显示,与兄弟姐妹共同治理的企业相比,夫妻共同治理的企业在促进公司发展方面展现出明显优势(Bird & Zellweger, 2018)。需要指出的是,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企业治理之间内在逻辑的梳理与认识有待拓展,内生机制也需进一步甄别,这些都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相对广阔的拓展空间。二是关注家庭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关系。家庭行为模型的设立与社会学密切相关,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公布了以提高贫困家庭生活质量和减少发展中国家不平等为目的的公共政策设计。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社会学方面其他政策的融合效果不容忽视,有机整合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相关的社会政策并进行综合分析也是拓宽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相关研究的重要方向。

#### 参考文献:

Addoum, J. M. et al(2016), "Limited marital commitment and household portfolios",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871296>.

Afridi, F. et al(2016),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child education in India: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rural

-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 *IZA Journal of Labor & Development* 5(1):1–27.
- Alakshendra, A. & D. Li(2020),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son preference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in India”, *Indian Economic Journal* 68(4):633–658.
- Ambler, K. (2016), “Bargaining with grandma: The impact of the South African pension on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1(4):900–932.
- Ambler, K. et al(2021), “He says, she says: Spousal disagreement in survey measures of bargaining pow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69(2):765–788.
- Anderson, C. L. et al(2017), “Husband and wife perspectives on farm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and evidence on intra-household accord in rural Tanzania”, *World Development* 90(1):169–183.
- Anderson, S. (2018), “Legal origins and female HIV”,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6):1407–1439.
- Anderson, S. & C. Bidner(2015), “Property rights over marital transfe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0(3):1421–1484.
- Ashraf, N. et al(2020), “Bride price and female educ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2):591–641.
- Baland, J. M. & R. Ziparo(2018),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in poor countries”, *Towards Gender Equity in Development* 69(1):332–335.
- Basu, B. & P. Maitra(2020),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and household expenditure 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Iran”,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4(2):606–627.
- Becker, G. S. (1965),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Economic Journal* 75(299):493–517.
- Belanger, D. et al(2011), “Marriage migrants as emigrants: Remittances of marriage migrant women from Vietnam to their natal families”,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7(2):89–105.
- Berniell, I. et al(2020), “The impact of a permanent income shock on the situation of women in the household: The case of a pension reform in Argent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68(4):1295–1343.
- Bertocchi, G. et al(2014), “Who holds the purse strings within the household? The determinants of intra-family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01(6):65–86.
- Bertrand, M. et al(2015), “Gender identity and relative income within household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0(2):571–614.
- Bhaskar, V. & E. Hopkins(2016), “Marriage as a rat race: Noisy premarital investments with assortative match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4(4):992–1045.
- Bird, M. & T. Zellweger(2018),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firm growth: Comparing spousal and sibling entrepreneurs”, *Organization Science* 29(2):264–283.
- Blau, D. M. & R. M. Goodstein(2016), “Commitment in the household: Evidence from the effect of inheritances on the labor supply of older married couples”, *Labour Economics* 42:123–137.
- Booyesen, F. & S. Guvuriro(2021),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tra-household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An application of coarsened exact matching”, *Journal of Risk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14(10):469–480.
- Bwanga, E. K. & C. Kabonesa(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a-household decision making dynamics and household savings-investment decisions: A feminist economics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3):102–121.
- Calvi, R. (2020), “Why are older women missing in India? The age profile of bargaining power and pover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7):2453–2501.
- Calvi, R. & A. Keskar(2021), “Dowries,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overty”,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2:268–303.
- Campaña, J. et al(2018), “Efficient labor supply for Latin families: Is the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relevant?”,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234218>.
- Castilla, C. & T. Walker(2013), “Is ignorance bliss? The effect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between spouses on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3):263–68.
- Chau, A. et al(2007), “Three-dimensional model for capillary nanobridges and capillary forces”,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in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5(3):305–331.
- Cherchye, L. et al(2012), “Economic well-being and poverty among the elderly: An analysis based on a collective

- consumption model”,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6(6):985—1000.
- Corno, L. et al(2020), “Age of marriage, weather shocks, and the direction of marriage payments”, *Econometrica* 88(3):879—915.
- Dayanti, M. V. & T. Dartanto(2017), “Trouble in paradise: How women’s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affects marital stability”, in: G. Lindawati et al(ed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outledge.
- Debnath, S. (2015), “The impact of household structure on female autonom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51(5):485—502.
- Deininger, K. et al(2013), “Women’s inheritance rights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esources in India”,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8(1):114—141.
- Dhanaraj, S. & V. Mahambare(2019), “Family structure, education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rural India”, *World Development* 115(C):17—29.
- Doepke, M. & F. Kindermann(2019), “Bargaining over babies: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9):3264—3306.
- Doepke, M. & M. Tertilt (2019), “Does female empowerment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4(4):309—343.
- Dong, X. (2022), “Intrahousehold property ownership, women’s bargaining power, and family structure”, *Labour Economics* 78, <https://doi.org/10.1016/j.labeco.2022.102239>.
- Doss, C. (2013),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8(1):52—78.
- Doss, M. T. (1990), “Police management: Sexual misconduct and the right to privacy”, *Journal of Police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17:194—204.
- Dyer, W. G. et al(2014), “Toward a theory of family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52(2):266—285.
- Esping-Andersen, G. & C. Schmitt(2020), “Multi-dimensional couple bargaining and housework allocation”, *Acta Sociologica* 63(1):3—22.
- Field, E. et al(2016), “On her account: Can strengthening women’s financial control boost female labor supply?”, *Growth and Labour Markets in Low Income Countries Programme Working Paper*, No. 32.
- Folke, O. & J. Rickne(2020), “All the single ladies: Job promotions and the durability of marriag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2(1):260—287.
- Friedson-Ridenour, S. & R. S. Pierotti(2019), “Competing priorities: Women’s microenterprises and household relationships”, *World Development* 121:53—62.
- Gay et al(2018), “Decomposing culture: An analysis of gender, language, and labor supply in the household”,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16(4):879—909.
- Getahun, T. D. & E. Villanger(2018), “Labour-intensive jobs for women and development: Intra-household welfare effects and its transmission channel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54(7):1232—1252.
- Gnagey, M. et al(2020), “Spousal influence and assortative mating on time preferences: A field experiment in the USA”,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18(2):461—512.
- Goldscheider, F. et al(2015), “The gender revolution: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hanging family and demographic behavi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1(2):207—239.
- Gray, R. S. et al(2013), “Happiness among adolescent students in Thailand: Family and non-family facto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0(2):703—719.
- Grosjean, P. & R. Brooks(2017), “Persistent effect of sex ratios on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72(1729):315—342.
- Gu, C. J. (2019), “Bargaining with Confucian patriarchy: Money, culture, and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Taiwanese immigrant families”, *Qualitative Sociology* 42(4):687—709.
- Guvuriro, S. & F. Booyesen(2021), “Family-type public goods and intra-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by co-resident South African couple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5(3):1629—1647.

- Haddad, G. K. (2015), "Gender ratio, divorce rate, and intra-household collective decision process: Evidence from Iranian urban households labor supply with non-participation", *Empirical Economics* 48(4):1365–1394.
- Hallward-Driemeier, M. & O. Gajigo(2015), "Strengthening economic rights and women's occupational choice: The impact of reforming Ethiopia's family law", *World Development* 70(C):260–273.
- Harari, M. (2019), "Women's inheritance rights and bargaining power: Evidence from Keny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68(1):189–238.
- Heath, R. (2014), "Women's access to labor market opportunities, control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domestic violence: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World Development* 57(C):32–46.
- Hendrick, C. E. & L. Marteleto(2017), "Maternal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autonomy and adolescent education in Hondura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6(3):415–439.
- Huang, Y. et al(2021), "The impact of family care for the elderly on women's 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rgaining pow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8115905>.
- Iyigun, M. & R. P. Walsh(2007), "Endogenous gender power, household labor supply an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1):138–155.
- Jayachandran, S. (2015), "The roots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7(1):63–88.
- Jun, W. et al(2021), "Do working women contribute to higher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Ekonomicky Casopis* 69(4):379–404.
- Khan, S. U. et al(2021), "Women's empowerment over recreation and travel expenditures in Pakistan: Prevalence and determinant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Empirical Insights* 2(1):1–9.
- Kulkarni, S. et al(2020), "Women's bargaining power and child feeding in Nepal: Linkages through nutrition information", *Maternal & Child Nutrition* 16(1):1–12.
- La Mattina, G. (2017), "Civil conflict, domestic violence and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in post-genocide Rwand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4(C):168–198.
- Lee, S. & P. Persson(2016), "Financing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9(9):2341–2386.
- Li, C. et al(2022), "TraB family proteins are components of ER-mitochondrial contact sites and regulate ER-mitochondrial interactions and mitophagy", *Nature Communications* 13(1):1–16.
- Li, L. et al(2021),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surname inheritance,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34(1):35–61.
- Lindstrom, D. P. et al(2022), "Life expectations in early adolescence and the timing of first sex and marriage: Evidence from a longitudinal survey in Ethiopia", *Reproductive Health* 19(1):1–15.
- Lowe, M. & M. McKelway(2019), "Bargaining breakdown: Intra-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and female labor suppl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Weiss Fund for Research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376.
- Luke, N. & K. Munshi(2011), "Women as agents of change: Female income and mobility in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4(1):1–17.
- Lyn, A. A. Y. (2021), "Male employment and female intra-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A Mexican gold mining case study",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19(3):699–737.
- Ma, X. & X. Piao(2019), "The impact of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on happiness of married women: Evidence from Japa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6):1775–1806.
- Majlesi, K. (2016), "Labor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women's decision making power within household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9(2):34–47.
- Mansoor, N. (2018), "Marriage payments and women's bargaining power in rural Bangladesh", *Journal of Demographic Economics* 84(1):79–105.
- Manser, M. & M. Brown(1980), "Marriage and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A bargaining analys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1(1):31–44.
- Mauri, C. A. & A. F. Wolf(2021), "Battle of the ballet household decisions on arts consumption", *Journal of Cul-*

- tural Economics* 45(3):359–383.
- Meurs, M. & L. A. Giddings(2012), “Maternal healthcare in Tajikistan: A bargaining framework”, *Feminist Economics* 18(3):109–140.
- Mishra, K. & A. G. Sam(2016), “Does women’s land ownership promote their empower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Nepal”, *World Development* 78(1):360–371.
- Miura, K. et al(2020),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an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Zambia”,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 20–01.
- Moeeni, S. (2021), “Married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Empirical Economics* 60(3):1411–1448.
- Moeeni, S. & M. Moeeni(2021), “The impact of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game on progression to third birth in Iran”,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42(1):61–72.
- Mukong, A. K. & J. Burns(2019), “Bargaining power within couples and health care provider choice in Tanzania”,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31(3):380–392.
- Mukong, A. K. & J. Burns(2021), “Parental bargaining and rural-urban child health differential in Tanzania”,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 38(6):938–953.
- Murshid, N. S. (2018), “Microfinance participation and women’s decision-making power in the household in Bangladesh”,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44(3):308–318.
- Nordman, C. & S. Sharma(2016), “The power to choose: Gender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ra-household educational spending in India”, WIDER Working Paper, No. 2016–61.
- Orth, U. & R. W. Robins(2014), “The development of self-esteem”,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5):381–387.
- Osamor, P. E. & C. Grady(2016), “Women’s autonomy in health care decision-mak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 8:191–202.
- Pangaribowo, E. H. & D. Tsegai(2019), “Women’s bargaining power and household expenditure in Indonesia: The role of gender-differentiated assets and social capital”, *GeoJournal* 84(4):939–960.
- Park, S. M. et al(2010), “The effect of paternal investment on female fertility intention in South Korea”,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1(6):447–452.
- Pollak, R. A. (2019), “How bargaining in marriage drives marriage marke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7(1):297–321.
- Porter, M. (2016), “How do sex ratios in China influence marriage decisions and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14(2):337–371.
- Qian, Y. & Z. Qian(2015), “Work, family, and gendered happiness among married people in urban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1(1):61–74.
- Rahman, M. W. et al(2020),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men’s views of women’s contribution to farming in Northwest Bangladesh”, *Sustainability* 12(9):1–21.
- Saleemi S. & C. Kofol(2022),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household decisions and gender equality in children’s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rural households in Pakistan”, *Wor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25, <https://doi.org/10.1016/j.wdp.2022.100395>.
- Schelling, T. C. (1956), “An essay on bargain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6(3):281–306.
- Schneebaum, A. & K. Mader(2013), “The gendered nature of intra-household decision making in and across Europe”,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Working Paper, No. 157.
- Seiz, M. (2021), “Equality in confinement: Nonnormative divisions of labor in Spanish dual-earner families during the COVID–19 lockdown”, *Feminist Economics* 27(1–2):345–361.
- Shelkova, N. Y. (2020), “Stronger women, better men? Family bargaining and public policy in contemporary Russia”,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18(2):335–355.
- Shibata, R. et al(2020), “Gendered intra-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dynamics in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processes: Assets, norms and bargaining pow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2(7):1101–1125.



- Steinmetz, S. et al(2022), "The gendered consequences of the COVID-19 lockdown on unpaid work in Swiss dual earner couples with children",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29(6):2034-2051.
- Sun, A. & Y. Zhao(2016), "Divorce, abortion, and the child sex ratio: The impact of divorce reform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0:53-69.
- Theلودis, A. (2018), "Wages and family time allocation",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126715>.
- Wang, S. Y. (2014), "Property rights and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7(C): 192-201.
- Wang, Z. et al(2020), "Bargaining power or specialization?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decision making in Chinese rural migrant families", *SAGE Open* 10(4):1-15.
- Wang, H. & Z. Cheng(2021), "Mama loves you: The gender wage gap and expenditure on children's educ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88(C):1015-1034.
- Weiland, A. (2022), "Married mothers' bargaining power and their accrual of pension entitlements: Evidence from East and West Germany", *Work, Aging and Retirement* 8(3):241-263.
- Wilcox, W. B. & S. L. Nock(2006),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Equality, equity, commitment and women's marital quality", *Social Forces* 84(3):1321-1345.
- Xiao, J. et al(2023), "Multi-round auction-based resource allocation for edge computing: Maximizing social welfare",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140:365-375.
- Yakita, A. (2018), "Fertility and education decisions and child-care policy effects in a Nash-bargaining family model",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31(4):1177-1201.
- Yilmazer, T. & S. Lich(2015), "Portfolio choice and risk attitudes: A household bargaining approach",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13(2):219-241.
- Zang, E. et al(2022), "Intrahousehold property ownership and children's undesirable behaviors in China",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4042438>.
- Zimmermann, L. (2018), "It's a boy! Women and decision-making benefits from a son in India", *World Development* 104(1):326-335.
- Zhang, H. & S. K. M. Tsang(2012), "Wives' relative income and marital quality in urban China: The role of perceived equity",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5(4):406-420.

###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XI Yanle LIU Yibing YIN Yuanyua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shift from a single model with consistent preferences and budget constraints in the neo-classical framework to a more reliable Nash household bargaining model, heterogeneous bargaining power that distinguishes household members' preference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household economics as a core element to explain household economic behavior and decision mak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reviews the representative literature from four aspects such as the definition, measurement system,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and concludes tha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family structure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At the same time, bargaining power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ntra-household decisions such as marriage, financing, employment, fertility, consumption, as well as social welfare factors such as offspring care, women's autonomy, and subjective feelings. Finally,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earch gaps and possible directions in this area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Keywords:** Bargaining Power;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Social Welfare

(责任编辑:刘新波)

(校对:刘洪愧)